

钞本《游庐山词》作者考辨<sup>\*</sup>

冯 乾

2007年初,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到卷末署顾炎武的钞本《游庐山词》一卷。该书卷首钤有“五凤砚斋”、“海西游客”、“曹秉章”诸印,可以判定经过清末民初叶玉森、曹秉章等名家收藏。词卷中收词共四十四首,末署顾炎武,字体与正文一致。卷中所收词记录作者游历庐山之行,在词题中即可见出游迹。首作为泊燕子矶,则是由南京水行发庐山也。其后列叙舟行所见沿途之景,最后有《别匡山》,结以《庐山五忆》词,构成一卷比较完整的庐山游记。中国诗歌史上山水诗极为发达,大家如谢灵运、王维、孟浩然等皆能极描绘之工,传山水之神。但在词体中专门状写山水,而且施以联章之体,构成如此巨制者,在《游庐山词》之前尚不多见。而且此卷描摹庐山风物,也确实能得庐山的真面目,词风清劲峭拔,自然有其审美价值,信为可传之作。然其作者是否顾炎武,则颇有疑问。

因为《亭林诗文集》中并未刊载词作,顾氏其他著述中也无一处提及词,清代的各种词选中也不见顾炎武词。郭则沄所撰《清词玉屑》中载录了顾炎武词,六首,为[忆江南]《庐山五忆词》五首及[迎春乐]《赠歌者》一首<sup>①</sup>。将《清词玉屑》所收顾炎武词与《游庐山词》作一对比,发现这六首词都是出于《游庐山词》。如果作者属实,北大图书馆所藏《游庐山词》可谓是顾炎武遗文的一次重大发现,据此可以考订顾炎武的经历以及词章,关系到亭林之学不小。然而郭则沄所据正是《游庐山词》,其言曰:“京师有以亭林《游庐山词》手稿求售者,吾友曹玉砚见之,索价昂不可得,乃密钞副本藏于家,其词亦不甚工,近乎赝托。”又曰:“然其词决非近人之作,不知何人手稿,为坊贾窜名耳。”<sup>②</sup>是郭氏对所谓的《游庐山词》并不置信,但未作辨伪。细考词卷中所涉的人事,与顾炎武的身世经历皆不相合,可以断定顾氏并非《游庐山词》的作者。

其一、钞本中有[金人捧露盘]《梦从家大人重游庐山》之作,词曰:

想匡庐,奇胜处,足三生。喜从游、再拓云肩。分明天上,松风吹落四仙

\* 本文为“211工程”三期“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”项目成果。

①②郭则沄:《清词玉屑》卷1,民国25年郭氏蛰园刻本。

亭。告吾翁、待儿扶杖，且听泉鸣。笑萍踪，还至此，烟霞癖，本家声。更翩翩、白鹤飞迎。徘徊故道，溪行犹见旧时僧。愧何能、比将羲献，唐突山灵。词中提及作者之父。按，顾炎武本生父顾同应，但顾炎武出生后即出嗣为其从祖顾苕芾之孙。因为苕芾的儿子，即顾炎武从父未婚而夭。其未婚妻王氏守志，服丧后即归于顾家，抚养顾炎武为嗣子。如果此词为顾炎武所作，则词中所称的“家大人”只能是顾同应。考《顾炎武年谱》，顾同应卒于明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当时顾炎武年仅十五岁。而词中所言之“家大人”显然尚存世。由此可见，若词卷作者为顾炎武，则其游庐山之年一定早于明天启七年。

其二、钞本中有〔调连理枝〕《庐山七夕寄内》一词，中有句曰：“记去年今夜，同把蛛丝结。”根据《顾炎武年谱》，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顾炎武娶太仓王氏为妻，时年二十岁，此词若为顾氏所作，则宜在崇祯六年。与上条游庐山应早于明天启七年的考订显然是矛盾的。

其三、钞本中有〔菩萨蛮〕《谷岩词答张鹿床大令》一首，考张鹿床名张芳，字菊人，鹿床为其号。江南句容人，清顺治九年（1652）进士，官知县。南京大学编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中收录其词八首。张芳为知县的时间当在清顺治九年以后，其时顾炎武至少年已四十。其舛互是显然的。

其四、钞本中有〔醉花间〕《山行报家兄逢其弟梁雪郢上》一首，据《顾亭林年谱》，顾炎武有弟兄五人，没有名或字逢其、梁雪的。

综上四条可知，钞本《游庐山词》的作者绝非顾炎武，出于赝托无疑。

而顾炎武也从无游庐山的经历。根据《顾炎武年谱》的记载，顾氏早岁居乡读书，虽然开始撰写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等巨著，但都是根据纸上文献编纂，并无实地考察。他也曾经到南京应过科举考试，其间有可能曾参与复社的虎丘大会。不过，其足迹应该不会越出江左一隅。等到崇祯十七年，明朝灭亡，次年清兵南下，顾炎武参加了抗清义军，先后被荐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司务、南明隆武朝的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并参与了昆山、嘉兴一带抗清斗争，志图恢复。这些抗清义举也都发生在东南地区。

抗清起义失败后，顾炎武埋名居乡里，不久因牵涉到人事的恩怨，浩然有远游之志。但顾炎武所向往的是中原地区，如其《流转》诗中所说的“丈夫志四方”、“浩然思中原”，《将远行》诗亦云：“去秋窥东溟，今冬浮五湖。长叹天地间，人区日榛莽。出门多蛇虎，局促守一隅。梦想在中原，河山不崎岖。”都未作西南之想<sup>①</sup>。清顺治七年，顾炎武避仇出游，自此，除了因为擒杀叛奴陆恩之事羁继昆山、松江年余外，其余的年月皆在漂泊旅寓中度过。他先后十谒明孝陵，后来足迹更远历中原、北方。这段行迹，在康熙元年（1662）顾炎武所作的《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徵天下书籍启后》中有涉及<sup>①</sup>，由此可见，顺治七年至康熙元年的十馀年间，顾炎武大致活动在今山东、北京、河南、河北、吴越、山西一

①周可真：《顾炎武年谱》“顺治五年”。

带。

此后顾炎武与李因笃等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，晚年又移居陕西华阴。在此之后，亭林虽曾屡次出游，但行迹多在京师及太行山左右之间，最南曾一至扬州。至清康熙二十一年，亭林卒于山西曲沃，盖自出游后终身未再踏入故乡。稽考顾炎武的相关谱记及其诗文集，都没有其履迹庐山的记载。因此，《游庐山词》题署顾炎武，实在很值得怀疑。

综览顾炎武的学行，他的一生都是瘁精殚力于经史之学，以筹划其经世济民的壮志。顾炎武有名言曰：“士以器识为先，一号为文人，无足观矣。”<sup>①</sup>如此看来，词为小道，顾炎武不加措意，不难理解。

根据对《游庐山词》内容的分析，其作者一定是明末清初时人。笔者偶然翻阅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，见第八辑第三十册有越閔的《春芜词》二卷。其中赫然有[忆江南]《庐山五忆》五阙，字句与钞本《游庐山词》全同。复通检一遍，则《游庐山词》所收的四十四首词全部收在《春芜词》中。至此，《游庐山词》作者之疑乃迎刃而解。越閔，原姓江，字辰六，安徽歙县人。江閔从祖天一，师从金声，当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）清军南下时，尝与金声共起义军抗清，事败被俘，就义于江宁。汪琬曾作《江天一传》，于其起事就义的始末言之甚悉，见于《尧峰文钞》卷三十四。江天一之事株连甚广，因此江閔之父举室迁于江都以避其难。江氏之改姓为越，大概即在此时。江閔早年尝经远游，王士禛谓其“早岁绝江淮，泛洞庭，南穷夜郎盘瓠之乡”。而其游庐山，则当在清顺治九年以后，盖此年张芳始中进士，其任官江右，必然在此年之后。

清人至康熙年间，政权渐趋稳固，江南地区公开反清之活动已经熄灭，对于清初武力反抗案件之株连也随之渐歇，江閔亦于清康熙二年应举人，榜名越閔。到康熙十八年，清廷举博学鸿词科以笼络汉人，江閔应荐与试，但是不第而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时越閔已经复姓为江。可见，清廷此时已不再关注江天一案，江氏后人因此不再亡命。

至于江閔之词为何被误认作顾炎武词，其原因仍然疑不能明，仅可作一猜测。江閔作《游庐山词》时，或者顾虑被告发，或有其他未知原因，未署其名，此无名之稿本遂尔流传。迨清乾嘉学术兴起，尊顾炎武为朴学山斗，道咸而后，则特别重视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，故其遗书率为人重视，因而遂有书商伪托顾炎武著作的情况。今考顾炎武著述多有赝作，如《五经同异》三卷，章学诚疑为后人假托；《经世编》十二卷，王蘧常疑其伪托；《一统志案说》，张穆谓其坊刻妄托；《海甸野史》，谢国桢谓其伪托；《惧谋录》四卷，沈嘉荣疑为伪托；《明季三朝野史》，谢国桢谓恐出于后人伪托；《圣安纪略》二卷，谢国桢谓恐出于后人伪托<sup>②</sup>。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可能是书商得到了《游庐山词》稿本，遂伪托顾炎

①周可真：《顾炎武年谱》“康熙元年”。

②（清）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21，“文人之多”条。

武以获多金。至郭则云据以收入《清词玉屑》者，当也是从此本中录出，故署为顾炎武。当然，原件本有署名，书商钞录时故意改为顾炎武，甚至直接从康熙间孙默的留松阁刻本越閩《春芜词》中录出游庐山的部分，而署为顾炎武《游庐山词》，这些可能也是存在的。唯其详今已不可得悉，仅能作如上的推论而已。

南京大学编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时根据《清词玉屑》收录了上述的六首词，但在顾炎武的小传后下了一条案语，曰：“诗馀仅见《清词玉屑》传钞数阙，疑为赝托。姑录之，俟考。”<sup>②</sup>则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的编者对于《清词玉屑》所载顾炎武词的处理，还是比较审慎的。另外，江閩的《春芜词》已经收进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中，但因为《顺康卷》卷帙浩繁，而当时的检索手段不如今天发达，所以编纂者未注意题顾炎武所作词亦在《春芜词》中，不无遗憾。整理大项古籍之难以及当时编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时筚路蓝缕之况，则又难为不知其中甘苦者道。今谨辨其伪，他日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修订时，可以据此删去顾炎武词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文学院

---

①周可真：《顾炎武年谱》附《先生著述目》。

②程千帆等编：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第2册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754页。